

作家的足迹

阎纯德



作家的足迹

阎纯德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50644

050644

责任编辑：常瀛生
封面设计：安今生
封面题字：朱 丹

作 家 的 足 迹

阎 纯 德 著

知 识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安定门内外东大街甲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5 插页2 字数301千字

1983年10月第1版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3,600册

书号：10214·3 定价：1.50元

序

洁 泯

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过去总有着一种不成文的程式在规范着，先写作家所处的历史背景，接着是写作品的思想内容，然后再写艺术成就，最后是归纳优点及其不足。对这种程式的要求，写多了好象不符合规格，写少了仿佛要补足。这样的研究文章，毛病常常流于枯燥，味同嚼蜡，而涉及到作家生平经历的材料极少看到。至于这个作家跟同时代另一个作家的比较研究就更属罕见，自不必说同当代的作家或者外国作家去相比了。这样的研究，也不能说毫无是处，但至少是种孤立的研究，静止的研究，缺少那种上下纵横的联系，就很难作出真正深刻的思想内容分析和艺术分析来。这种方法，宛如坐井观天，不知天地之广阔，思路狭仄，见地窄小，谈鲁迅的不涉及郭沫若，研究茅盾的不知有沈从文。打个比方，这类研究方法，是研究工作中的一种贫血症。

这几年，出现了一点新路子，写作家传记、评传，写风格流派的比较研究和综合研究的文章多起来了。新路子的开辟，标志着研究的领域和研究者的视野开阔起来了。研究者不仅看作品，看作家风格，还要研究作家生平，研究作家的文学生

涯。这种研究是一种深入的研究，比之孤立地研究作品的方法，实在要生动得多，高明得多。

现在阎纯德同志的这本书，则又是一种别开生面的文学家传记体的著作。它的特点不只是写一个作家或一个流派，而是荟萃诸家的传记于一炉，是写了作家群。它又并无什么固定的规格，也不受任何“名单学”的牵掣，谁入书，谁不入书，而是依照作者积累的材料所得，信手而成，自成系统。这些文章的特色，不在于作者有连篇累牍的论述，而恰在于所取的材料之生动而新鲜，内中既写着作家的思想，又记叙着作家性格及其情操。读起来所获得的印象，不是理论思维的缕析，倒是充满了形象性的关于作家创作历程中一则则生动的断片。

作家研究还只限于他的作品，是极容易陷于主观和片面的。例如研究鲁迅的《野草》，和他同年份所写的《华盖集》相较，不论是思想和格调，两部作品似乎很难和谐起来。倘只是从作品本身而论，恐怕是难以得到准确的解答的，得到的无非是论者的那种就书论书的主观的解答。这里，就有赖于对作家生平的研究，思想的研究，一直到当时作家所处的特殊环境中所出现的思想的复杂状态的研究。这些地方，这一类具有特殊作用的形象性的生平资料，思想资料，就相当有助于此种研究的深入。写一个作家的评传并不容易，不仅作品是复杂的，作家也是复杂的，不独要研究他的作品，还要对他每一时期的思想材料、书信、日记以及其他有关生活变化的资料，都应认作是不可小看的研究对象。贝奇柯夫写《托尔斯泰评传》之所以深切，所以具有如此令人信服的科学性，完全是作者全

部掌握了托尔斯泰研究的应有的资料才得以完成的。

我以为，阎纯德同志这本书所作的努力，也正在为积累作家的作品以外的资料增添着砖瓦，这是极有意义的事。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我们与其说已经做得很多，还不如说在某一点上只是刚刚开始了一个新的起点，这个工作，需要很多人的艰辛努力才能见到规模。纯德同志在这方面，编写了不少书，还写了不少散文，他在给我的信中说：“我想我将以研究和创作这两条腿走完此生”，这是很使人感动的話。他现在所做出的这一成绩，作为朋友的我，就感到无比的欢喜，我遂不计谀陋写这篇序，为的是分享着他的成就所获得的快慰。

1983年2月

17002/04

目 次

序.....	洁泯 1
郭沫若及其《女神》.....	1
新文学第一代开拓者冰心.....	46
陈衡哲及其《小雨点》.....	89
“五四”的产儿——庐隐	109
作家、画家凌叔华	142
阳翰笙及其创作	154
谢冰莹及其创作	230
记萧军.....	260
从黑夜到黎明——记白朗	290
小说家罗洪	308
白发吊着夕阳——记萧乾	327
举着生命的火把——记骆宾基	339
雷加的足迹	347
生活，刚刚开始——记杲向真	359
煤，在燃烧——记李纳	377
柯岩及其创作	400
聂华苓及其作品	426
破损的小舟，扬起希望的风帆——记田琳	454
后记	474

郭沫若及其《女神》

郭沫若是“五四”运动以来，对中国新文化发展有着伟大、不朽贡献的巨人，他和鲁迅一样，是中国新文学的曙光……

第一次听到“郭沫若”的名字，是在刚刚解放了的穷乡僻壤——黄河岸边，那时我是一个才受启蒙教育的小学生。以后，我背诵着《天上的市街》和《炉中煤》，辗转古



都开封，从一个满身泥巴的农民的儿子，变成一个诗歌的狂热的读者和“作者”。当我抱定终生献身文学事业，郭沫若变成了我心中活着的“诗神”。踏进北京大学中文系之后，在贝公楼的学术报告会上，挤在第一排的我，脑海里永远烙下了郭沫若的声音笑貌。十载灾难，阴阳颠倒，人民的大文豪被贬成“罪人”，但我对“诗神”的尊崇没有减少分文，相反，我在巴黎讲授了“郭沫若专题”，让中国的“女神”在法国寻找知音。那

时，我在异国朗诵《地球，我的母亲》，在塞纳河畔低吟着“春潮涨了，春潮涨了，死了的宇宙更生了。生潮涨了，生潮涨了，死了的凤凰更生了……”我的心和千百万读者一样，同他的心很近，都期盼着“女神”的再生，春天的来临……

一九七七年秋，一场恶梦之后，当我从巴黎回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冒然写信给他，详细述说我拟与朋友编写《中国文学家辞典》的想法和计划，希望得到鼓励和支持。那时，我毫不知道他已身沉重病，久卧不起。于立群同志告诉我，郭老很关心《文学家辞典》的编写，并希望它早日问世，只是力不从心，不能予以具体的帮助。半年多后——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二日，那天正当我在印厂三校郭沫若小传、《辞典》准备付型之时，传来他溘然长世的噩耗……泪水打湿了那篇三千余字的小传，那便是一个普通的崇拜者对这位文化巨人的悼念……

郭沫若是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是中国杰出的诗人，卓越的历史剧作家、散文家、小说家、文学翻译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书法家、卓越的思想家、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在中国文化史上，象他那样知识渊博，才华卓著的学者和作家并不多见。他的一生跨越了几个时代，从“五四”前夕到逝世，六十多年写作和斗争道路，是他一生思考、探索、追求和理想的珍珠串联成的一部闪光的历史。

一八九二年十一月十六日（阴历九月二十七日）郭沫若生于四川省乐山县沙湾镇上的一个中等地主的家庭里，原名郭开贞，号尚武，乳名文豹，因为他排行第八，所以母亲又叫他八儿；“郭沫若”是他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一日在《时事新报》副刊

《学灯》上开始发表诗作时用的笔名。他的家庭虽然不是一个世代书香门第，但从祖父开始也都是读过书的。他的母亲姓杜，是一个零落的官家的女儿，聪明、乐观、开明、自负心强，没有读过书，全凭耳濡目染认得一些字，能暗诵好些唐诗。幼年时代，母亲对他影响最深。母亲教他背诵很多唐诗，“淡淡长江水，悠悠远客情。落花相与恨，到地亦无声。”这样的诗句，他一直还能记得。郭沫若说：“人生的开始应该就是学生时代的开始。我母亲事实上是我真正的蒙师，她在我未发蒙以前就教我背诵了好些唐宋人的诗词了。”（《沫若自传·学生时代·我的学生时代》）郭沫若四岁半就开始受家塾教育，在家里的对着峨嵋山第二峰的“绥山山馆”从学于沈焕章。在他读的书中，《诗三百篇》、《唐诗三百首》、《千家诗》等都念得很熟，而且很喜欢司空图的《诗品》，这对他后来的诗歌理论是有影响的。他回忆童年生活时曾说：“比较易懂的《千家诗》给予我的铭感很浅，反而是比较高古的唐诗很给了我莫大的兴会。唐诗中我喜欢王维、孟浩然，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沫若自传·少年时代·我的童年》）

四川，自古以来被誉为“天府之国”。郭沫若的童年生活是充满了诗情画意的。故乡依山傍水，山青水秀，风景如画。峨嵋山下的大渡河，在夏天，水流湍急，奔腾咆哮；在冬天，水波明秀，美似江南。家乡人总爱用文雅的字眼形容这美丽的自然环境：“绥山毓秀，沫水鍾灵。”绥山是峨嵋山的第二峰，沫水就是大渡河。这样的地方就是他童年生活的摇篮。郭沫若

的童年，不仅有屈原、李白、孟浩然、庄子、柳宗元的影响，更有破败的农村，兵慌马乱的现实给他幼小心灵留下的深深烙印。“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便是清末以来四川的生动写照。这些客观的和人为的现实对郭沫若以后的创作，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有着深刻的直接的关系和影响。

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后，家塾教育开始改革，废诗课，废科举，兴学校，时代的潮流比大海的潮流更难抗拒，它改变着社会，也塑造着人。虽然家中购置了颇多的经史子集，他却于四书五经及唐宋诗文之外不仅学到了新学课本、笔算数学，还读到诸如《启蒙画报》、《经国美谈》、《新小说》、《浙江潮》一类的新书报。新思想犹如春风，给他以启示，把他带到了广阔天地。这时候，进了新学堂的大哥劝他将来学习实业，以图富国强兵。那时候，“富国强兵”既是时髦的口号，更是爱国人士的信仰和追求。当时年仅十岁左右的郭沫若便接受了这种思想。这是他爱国主义思想发展的第一步。

一九〇五年十三岁的郭沫若考进嘉定县的高等小学。他对于这个学校十分不满。因为他年龄小，就时常受到大学生的侮辱。有一次，他的考试成绩名列第一，遭到大学生忌恨，不仅撕了榜，还侮辱他，对此老师不但不制止，反而改了榜。这件事强烈地刺激了年幼的郭沫若。他回忆说：“……对于我一生是第一个转扭点，我开始接触了人性的恶浊面。我恨之深深，我内心的叛逆性便被培植了。”（《沫若自传·学生时代·我的学生时代》）以后因为他反对旧教育制度，带头闹学潮，曾一度被学校开除。

一九〇七年，郭沫若考入嘉定中学。这时的少年郭沫若，心中的革命家是章太炎，十分赞赏他的革命言论，对《意大利建国三杰》和《经国美谈》中所描写的仁人志士有着深切的敬意。嘉定中学，校政腐败，教员低能，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望，他只好去读古典作品，如《西厢记》等，欣赏、同情书中那些遭遇不幸，行为悲壮的耿介之士。同时他还读了不少影响他走上文学道路的林译小说。他说：“林译小说中对于我后来的文学倾向上有决定的影响的，是司考特的《撒喀逊劫后英雄略》，……那种浪漫主义的精神他是具象地提示给我了。我受司考特的影响很深，这差不多是我的一个秘密。……我读司考特的著作也并不多，实际上怕只有《撒喀逊劫后英雄略》一种，我对于他并没有什么深刻的研究，然而在幼时印入脑中的铭感，就好象车辙的古道一般，很不容易磨灭。”（《沫若自传·少年时代·我的童年》）我想，这可能也是郭沫若作品中浪漫主义的一个最早的源头。

一九一〇年春，郭沫若来到憧憬多年的成都，考进成都分设中学。他积极参加爱国运动，成为学生运动中的活跃人物。辛亥革命确实曾使他兴奋过，认为把皇帝打倒，可谓一场天翻地覆的革命。但不久，他也看到了革命的问题，于是如一般知识分子一样，他的政治热情受到挫伤，空虚苦闷，失望折磨着他。但是，他的伟大抱负、富国强兵的爱国主义思想的火焰并没有熄灭。他天天想着离开四川，“在那时最理想的目标是游学欧美，其次是日本，又其次才是京津、上海”（《少年时代·初出夔门》），目的是向西方寻找使祖国富强起来的科学技术和

拯救祖国的真理。成都中学毕业时，他考取天津军医学校，但事实上当时没有存心学医，“应考军医只是想借一个机会离开四川，离开当时的苦闷”（《我的学生时代》）。他是在一九一三年北国飞着大雪的时候离开家乡的，那长江、黄河、祖国的关山、田野、城村，都在这位青年爱国者的感情里最早地酿成了诗句……

到了天津之后，那里的现实使他“没有心肠入校”，于是跑到北京，那时他的长兄橙坞正在做川边驻京代表。郭沫若回忆说：“这儿又是我一生的第二个转扭点，我到后来多少有点成就，完全是我长兄赐予我的。”（《我的学生时代》）经他长兄介绍，郭沫若于年底，告别苦难的祖国，取道朝鲜，在釜山迎接了一九一四年的元旦，一星期后，到达日本东京。同年秋，在报考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时，他无心地和印度的大诗人泰戈尔的作品接近了。当他读泰戈尔的《新月集》中几首英文诗时，兴奋极了：“分外感受着清新而恬淡的风味，和向来所读过的英诗不同，和中国的旧诗之崇尚格律雕琢的也大有区别。从此我便成了泰戈尔的崇拜者。”（《沫若自传·学生时代·创造十年》）一九一五年他转入岡山第六高等学校，与郁达夫、成仿吾同学期间，学泰戈尔，也用英文做过无韵的诗。这一年，当日本政府向北洋军阀政府就签订“二十一条”施加压力时，他愤然回国，打算弃学从戎，当时他作的《七律》，便是这位赤子的爱国心声：

哀的美顿书已西，冲冠有怒与天齐。

问谁牧马侵长塞，我欲屠蛟上大堤。

此日九天成醉梦，当头一棒破痴迷。

男儿投笔寻常事，归作沙场一片泥。

经过三年多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和外国语的学习，他于一九一八年升入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开始的前两年，对医学興味盎然：“人体医化学和生理的实习，都是引人入胜的东西。”但由于他十七岁时得过一次重症伤寒，两耳变得耳鸣重听，听力受到破坏，在大学一年级时，身心的痛苦，时代潮流的激荡，中外著名诗人的影响，使他文学的倾向不得克服，就深感自己学医是走错了路，想弃医改入文科。但到了大学的后两年，临床功课给他带来无上的痛苦，终于无情地逼他走上了文学的路途。他回忆说：“自己在国内所涉猎的，主要的就是文学。到了日本虽然把文学抛弃了，但日本人教外国语，无论是英语、德语都喜欢用文学作品来做读本。因此，在高等学校的期间，便不期然而然地与欧美文学发生了关系。我接近了泰戈尔、雪莱、莎士比亚、海涅、歌德、席勒，更间接地和北欧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都得到接近的机会。这些便在我的文学基底上种下了根，因而不知不觉地便发出了枝干来，终究把无法长成的医学嫩芽掩盖了。”（《我的学生时代》）

一九一六年至“五四”运动前夕，黑沉沉的暗夜笼罩着中国，也笼罩着游子郭沫若的心。他徬徨苦闷，有时候“每天只把庄子和王阳明和《新旧约全书》当作日课诵读”，“有时候想去当和尚”。这时期，他写过“出门寻死去，孤月流中天。寒风冷我魂，孽恨摧吾肝……痴心念家国，忍复就人寰。归来入门首，吾爱泪汎澜”（《寻死》），“有国等于零，日见干戈扰。有家

归未得，亲病年已老……有生不足乐，长望早死好。”（《夜哭》）一类伤怀、苦闷，同时表现他爱国之心的抒情小诗。

江河的归宿是大海，它要到那里聚积力量，寻找永恒！人，活着应该发光，发热——为社会、为人类。但人生道路的选择，盲目者并不少见。郭沫若从中学时代起就一直追求真正的人生，渴望献身于民众。当他踏上通往社会的路途时，他最初学医是为了报国济民，当他想弃医习文时，也是出于爱国的目的，为了鼓动民众的热情改造社会。这种思想，固然有多种因素，但于十月革命的影响是相当重要的。他曾说：“……应该感谢十月革命，它唤起了当年的青年，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沫若选集·序》）

伟大的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影响着一代爱国青年，在这时代浪潮的感召下，身在异国的郭沫若和郁达夫、成仿吾等几位中国留日学生组织了以抗日救国活动为宗旨的“夏社”。他们把日本各报刊登载的鼓吹侵略中国的言论和资料收集起来，译成中文，再向国内各报社和大学投寄。这一工作对“五四”运动更蓬勃的兴起，是有积极推动作用的。一九一九年春，郭沫若根据“途中经过朝鲜的一段经历，便借朝鲜为舞台”创作了第一篇名为《牧羊哀话》的小说，“把排日的感情移到了中国人的心里”，表达了他对弱国人民的同情。这篇小说有着强烈的反帝情绪，最早表现了爱国反帝的主题，是新文学中最早的作品之一。

任何一个作家，无论他有着天资才华，无论他用什么体裁从事创作，都不能不受客观条件和因素的影响，即便那些所谓

偶然的机缘“误入”文坛的，也无法摆脱这个巨大力量的左右。郭沫若的一生，也是在这不可抗拒的规律中生活的。他作诗的经过是相当长远的，所以成为伟大诗人，是时代创造的结果。他在《我的作诗的经过》中，曾历数了自己成为诗人的脚印，他说：“我自己是受科举时代的余波淘荡过的人，虽然没有做过八股，但却做过《赋得体》的试帖诗，以及这种诗的基步——由二字至七字以上的对话……但这些工作的准备，即读诗、学平仄四声之类，动手得尤其早，自五岁发蒙时所读的《三字经》、《唐诗正文》、《诗品》之类起，至后来读的《诗经》、《唐诗三百首》、《千家诗》之类止，都要算是基本工作。由于这些基本工作及练习，到十三岁进小学受新式教育为止，虽然也学到了一些旧诗的滥调，时而也做过一些到现在都还留在记忆里的绝诗的短章，但是真正的诗的趣味和才能是没有觉醒的。”他的诗的觉醒，是一九一三年，那时他已经二十二岁，是成都高等学堂一年级学生。当时他在英文读本中发现了美国的朗费洛(Long Fellow)的《箭与歌》(Arrow and Song)那首两节的短诗。那诗使他感到异常的清新，“就好象第一次才和‘诗’见了面”。那简单的对仗式的反复，使他真正“悟到了诗歌的真实的精神”，发现了诗之美。但那是个以喊实业救国为时髦的时代，文学被人鄙弃，连本来倾向文学的郭沫若，“虽然诗的真面目偶尔向自己的悟性把面罩揭开了来，但也拒绝了它，没有更进一步和它认识的意欲。”一九一五年上半年，他读到油印的泰戈尔的《岸上》(ON THE SEASHORE)、《睡眠的偷儿》(SLEEP—STEALER)等没有韵

脚、两节或三节对仗的英文诗，那种清新和平易使他吃惊，尔后便同泰戈尔诗结下了不解之缘，如饥似渴地读了《新月集》、《园丁集》、《吉檀伽利》、《爱人的赠品》，译诗《伽毗尔百吟》，戏剧《暗室王》。郭沫若说，在泰戈尔的诗里，“我感受着诗美以上的欢悦”。这时，他偶尔还读到了比利时的梅特灵克的《青鸟》和《唐太儿之死》，这使他更加爱上了泰戈尔诗的明朗性。不久，他的诗情，终于在爱情的滋润下萌发出来，为安娜写下《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别离》等不少抒发苦闷之情、寄托期盼之心的小诗。那时是一九一六年。稍后，他还受到德国诗人海涅的影响，并认为海涅的诗歌显示着丰富的人间，而且更近乎自然。一九一九年九月，他在《时事新报·学灯》上第一次看到的白话诗是康白情的《送许德珩赴欧洲》，这给他以胆量，向报社投寄诗稿。这一年的暑假，他还开始了翻译歌德的名著《浮士德》，后受共学社的怂恿，便从事此著的全译。

在大学二年级，正当郭沫若写诗向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投稿的时候，他读到了美国资产阶级进步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郭沫若说：“他那豪放的自由诗使我开了闸的作诗欲又受了一阵暴风般的煽动。”（《沫若自传·创造十年》）“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到了喷火口，我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我在那时差不多是狂了。”（《沸羹集·序我的诗》）诗人还说：“但使我的创作欲爆发了的，我应该感谢一位朋友，编辑《学灯》的宗白华。”（《沫若自传·创造十年》）宗白华先生对于诗人的创作是给与了很大的支持的。在一九一九年